

# 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

孙宜学 编

泰戈尔

# 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

孙宜学 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孙宜学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336-4358-4

I. 不… II. 孙… III. 泰戈尔, R. (1861~1941)—演讲—文集  
IV. Z4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739 号

策划编辑：包云鸠

责任编辑：尚燕彬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天添工作室

---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72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孙宜学

进入 20 世纪,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慢慢敞开了大门,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恢复、丰富起来,拜伦、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杜威、罗素……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访问了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他的来访重新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焕发活力。泰戈尔是抱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访华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在今天的人看来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 上篇 翻译介绍

泰戈尔与中国的这次文化交流,是由他访华前中国文化界对其思想和作品的翻译介绍拉开序幕的。这一序幕大致分三个阶段徐徐拉开。

## (一)

泰戈尔与中国的最早接触,开始于“五四”前后,这与他在1913年以英译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直接关系。因为他的获奖,不仅印度人感到欢欣鼓舞,实际上整个亚洲都在为此载歌载舞——这毕竟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世界荣誉。

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欧洲就已经获得了不少赞誉,得奖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而泰戈尔也频繁地被邀请到欧洲和美洲各国巡回演讲,到处宣传东方的精神文明。所到之处,万人称颂,一路鲜花和掌声。一时间,《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而英国女王也适时地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锦上添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诗人对欧洲感到了失望,于是转而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和日本,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多次访问。1914年之后,欧洲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传到了日本。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在这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泰戈尔作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必然让作为邻邦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翻译介绍他和他的作品时自然也就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的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是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上发表的钱智修的文章《台莪尔之人生观》。该文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并说泰戈尔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人类之趋向,由恶而驯至于善而已”。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一种“献身于理想、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利者”的生活,“台氏所谓善之生活,即人类全体之生活者”,“泰戈尔属于那种明知快乐而避之者,明知苦痛而求之者”,认为只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较高的价值。文章盛赞了泰戈尔在生活和创作上那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文章还附有一幅泰戈尔的像。而让人欣慰又不解的是,中国这第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实际上远远比后来的一些只知道赞扬或批评的文章更全面,更有价值。

从1915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15年10月15日,

《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用文言翻译的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以《赞歌》为题,署名为达噶尔著。在“注”中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其中除了把文学奖误当作和平奖外,其他介绍基本上是中肯的。

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系统地接触到泰戈尔作品的是当时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sup>①</sup>1914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有机缘接触了泰戈尔的英文诗。有一天,一个同学从学校里带来几页油印的英文诗,郭沫若接过来一看,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里的几首诗。结果郭沫若是一读就欲罢不能,一下子就被这些清新平易的诗迷住了:“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经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于是他就和“太戈尔的诗结了解不解之缘”。随后他把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比尔百吟》、戏剧《暗室之王》,“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简直成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sup>②</sup>他还尝试着把这些诗翻译出来,并模仿着写诗。他第一阶段所写的诗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泰戈尔式的。可以说,是泰戈尔的诗使当时正处于失意彷徨之中的郭沫若找回了精神的平静,也刺激了他诗的觉醒。

这一时期有一些人出于个人的兴趣对泰戈尔表示出好感或受到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的影响。如冰心就把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等诗集中的一些诗翻译出来发表,还模仿着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这样的泰戈尔式的诗集。并且充满深情地“遥寄”泰戈尔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sup>③</sup>而郑振铎也是因为倾心泰戈尔作品的精美优雅而最早较多地把泰戈尔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还有王统照,也是在这时期开始注意泰戈尔的。但这些翻译介绍都是零星地散刊于各报纸杂志上,没有形成大气候。

此时这些零星的影响还不足以构成中国的“泰戈尔热”,中国国内对泰戈尔总体上来说还是冷淡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1917年年底,郭沫若为生

计,将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中的一些诗翻译编辑成一部小集子《太戈尔诗选》,交给国内的出版社出版。结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不接受,郭沫若还因此对泰戈尔生出反感。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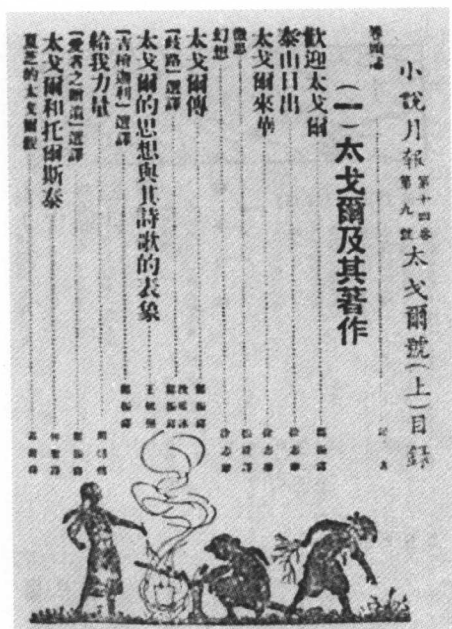
我国真正的“泰戈尔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而这股热潮的出现,与对欧洲“泰戈尔热”的介绍分不开。

从1921年起,泰戈尔的行踪开始广泛受到国人的关注,他的作品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他的思想和人格开始被研究。1921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沈雁冰的短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介绍泰戈尔在纽约的活动情况,并说泰戈尔打算在“东美各大城镇游历演讲后,再到西美”。同年8月,留德学生王光祈发表《太戈尔之山林讲学》,介绍了泰戈尔在德国柏林等三大城市的三次演说盛况。文中谈到,德国学者“纷纷专车前往各城听其演讲,其一种欢迎东方学者之狂热,远在吾国欢迎西方学者杜威、罗素以上,此亦战后东西文化对流作用之一种表现也”。文章还谈到泰戈尔此次来欧洲之前,在欧洲就已经掀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甚至有一个德国人对宗白华说:“君等现在来德留学,吾等不日亦将赴中国留学。”该篇文章记述了泰戈尔在德国的三次演讲,并总结了泰戈尔此次德国之行所要宣扬的基本主题,即东方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文章同时也介绍了德国、法国学界对于泰戈尔的不同态度,以及泰戈尔受到欧洲一部分学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战后德国学者对于西洋文化颇多怀疑”,“太戈尔即系诅咒西方物质文明拥护东方精神文化者,故此时来德,正合德人口味,其受热烈之欢迎,亦不足为怪。唯同时又有一部分学者,见德人将太戈尔奉为神圣因而激起反感,乃痛诋太戈尔系一个滑头,并谓一般德人委弃国粹,甘受他人愚弄,引为世道人心忧”。<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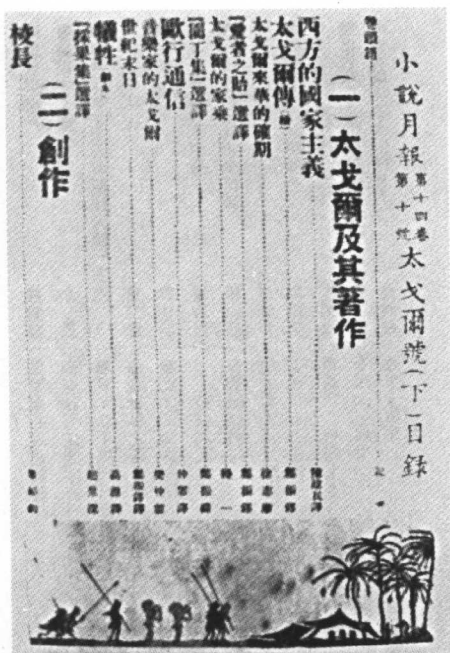
8月10日,《东方杂志》又转载了俞颂华的文章《德国欢迎印哲台栽尔盛况》。该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泰戈尔在德国的三次演讲的内容,与王光祈文恰为互相补充。文中记载了泰戈尔在谈到中国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国有最古的历史,优美的文化,爱和平的民众,可惜也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荼毒,很难得到充分自由自发的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封面



《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泰戈尔号目录(上)



《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泰戈尔号目录(下)

《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目录

[illegible]

《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目录

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四號目次

|                              |     |                             |      |
|------------------------------|-----|-----------------------------|------|
| 消極道德論                        | 錢智修 | 草萊心理之特徵                     | 章錫琛  |
| 論畫一主義之教育                     | 余競  | 克拉克氏識字習草之馬                  | 錢智修  |
| 日耳曼統一主義與斯拉夫統一主義              | 錢智修 | 日本新千里眼出現                    | 章錫琛  |
| 說茶 <small>附圖十</small>        | 曾耀垣 | 飛行界之新發明                     | 李加爾  |
| 論美國之對華貿易                     | 錢智修 | 東洋鐵錠協會幹事與實業之日本              | 章錫琛  |
| 印度中國之改用金幣說                   | 孫祖烈 | 搜探縮說書                       | 章錫琛  |
| 蘇巴拿馬運河記 <small>附圖十二</small>  | 錢智修 | 製紙原料問題                      | 章錫琛  |
| 巴鐵幹問題之經過 <small>附圖十八</small> | 許家慶 | 劇業光波之淨水作用 <small>附圖</small> | 海若   |
| 英國地理與歷史之關係                   | 唐樂鳴 | 空中鐵道 <small>附圖</small>      | 甘永記  |
| 巴式利氏之中國幣制改革說                 | 壹盒  | 清宮二年記 <small>附圖一</small>    | 王國維  |
| 台義爾氏之人生觀 <small>附圖一</small>  | 錢智修 | 宋元戲曲史                       | 東吳舊錄 |
|                              |     | 五十故事                        |      |

机会。”<sup>⑤</sup>他还希望东西方应该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促使世界朝着博爱和平的道路发展。同年11月,《少年中国》第3卷第4号发表魏嗣銮的文章《旅德日记》,对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也作了一般性的介绍。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早期的介绍中,介绍者所关注的主要是作为思想家和  
社会改革家的泰戈尔,而不是作为文学家的泰戈尔。如俞颂华的文章就把泰戈尔  
与罗素、托尔斯泰、克鲁鲍特金相提并论,这和国内救亡图存的政治局势和思想倾  
向有关。

对泰戈尔作品的介绍,这一时期也逐渐多了起来。1920年2月、3月,《少年  
中国》第1卷第8、9期发表了黄仲苏译的《太戈尔的诗十七首》。译者在序中对  
泰戈尔作品的特色作了精辟的介绍:“太戈尔是多情的诗人,他爱他的祖国印度,  
他醉心于东方的文明。他看自然界的花草虫鸟日月星辰风雨山水等等如同是不  
能描写的、纯洁的、隽妙的美之无穷表示,世间唯有这种美,可以引起我们人类对  
于宇宙诚挚而雄厚的爱情。因为太戈尔能观察了解宇宙,并能用音韵描写万象,  
所以他便成了宇宙的情人,同时也成了宇宙的诗人。”1921年1月10日、4月10  
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第4号发表了郑振铎译的《杂译太戈尔的诗》,其  
中第4号还有许地山译的泰戈尔的小说《在加尔各答途中》,并附跋;而第5号上  
则发表了瞿世英翻译的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1921年4月17日,《民国日报·  
觉悟》也刊出《译太戈尔〈园丁集〉第二十三首、二十四首》,译者为太白。

对泰戈尔的研究,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有瞿世英、郑振铎。他们从1921年2  
月27日至4月3日在《晨报》第七版副刊连载《太戈尔研究》,1921年4月14日、  
15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关于泰戈尔的通信。其他还有冯友兰的《与印  
度泰戈尔谈话》(《新潮》1921年10月1日,第3卷第1号),俞之的《台莪尔与东  
西文化之批判》(《东方杂志》1921年9月10日,第18卷第17号),梁漱溟在《东  
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论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1月初版)和瞿世英  
的《演完太戈尔的〈齐德拉〉之后》(《戏剧》1921年10月30日,第1卷第6期)。  
1922年则有两本关于泰戈尔哲学的著作出版,一是张闻天的《泰戈尔哲学》(商务  
印书馆),一为冯飞的《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商务印书馆)。两书对泰戈尔的基  
本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观都作了介绍。而在1922年2月10日《小说月报》

第13卷第2号上的《文学家研究》栏里,则出了一个关于泰戈尔的小专号,内收文有《太戈尔传》(郑振铎)、《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张闻天)、《太戈尔的艺术观》(郑振铎)、《太戈尔的妇女观》(张闻天)、《太戈尔的“诗与哲学观”》(张闻天)、《太戈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瞿世英),并附有“太戈尔的最近小影及其手迹”,形成了泰戈尔来华前的一个翻译介绍的小高潮。

早期这些关于泰戈尔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从各个方面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人格和艺术特色。泰戈尔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打破印度狭隘的宗教传统、积极肯定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他那些清新宜人,歌颂大自然的诗歌、小说,都令中国人为之倾倒。加上中印两国都属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迫害甚苦的民族,这就很容易使中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这位异域的诗哲。这种倾向本身就是有倾向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势力关注泰戈尔的更多的是他的人格和他提出的解决世界危机的办法,即使对他的诗歌、小说进行介绍,也侧重于他的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人的人格力量。这就如郑振铎在介绍泰戈尔的艺术观时所说的:“在太戈尔看来,艺术的美不过是工具,而不是艺术的最完全的最著的特征。它不过用来为更有力的表现我们的人格的工具而已。”<sup>⑥</sup>但这样说并非否定泰戈尔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只不过与对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介绍相比,对文学的关注较少而已。

### (三)

泰戈尔对中国早就表示了关注。他曾去过欧美和日本访问,但一直没有机会到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中心的中国访问,这对他来说也是很遗憾的事。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像的中国,此后那富丽的天朝竟变了我的梦乡。”在接受冯友兰访问时,他就充满感情地说道:“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从前到日本,没有到中国,至今以为憾。后有一日本朋友,请我再到日本,我想我只要再到日本,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我自到纽约,还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你前天来信,说要来见我,我很觉得喜欢。”<sup>⑦</sup>就是在这样的愿望的驱动下,1923年4月,泰戈尔派自己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中国联系访华的相关事宜。恩厚之首先找到北京大学有关部

门,表示泰戈尔有意访华,北京大学对泰戈尔来华表示欢迎,但因本身种种复杂的原因而无法承担接待任务。恩厚之又找到徐志摩,徐一听泰戈尔要来中国,真是欣喜若狂,马上带着恩厚之找到当时很有影响也很有背景的讲学社接洽。听说名闻世界的诗人自己愿意到中国来,而且只要讲学社承担旅费,其他在华一切费用完全由泰戈尔自己承担,这和刚刚访问过中国的杜威等外国学者明显不同(后者在华的一切费用完全由中方承担),这不是喜从天降还能说是什么?讲学社立即同意承担接待任务,并且马上给泰戈尔寄去了旅费,盼望他8月份能来,随即又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希望他能惠顾中国讲学。准备参加接待的团体还有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

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可以想见,这个已名满全球的印度诗人能答应来中国讲学,会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怎样的震动和兴奋。“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已很久没有什么热点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为此又开始躁动起来,各种团体和一些重要的政治或文化人物纷纷对此作出反应。当时的热闹情景恰如徐志摩在1923年12月27日致泰戈尔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驾莅临。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这些话当然难免夸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足以说明泰戈尔要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震动。

自泰戈尔答应来华至1924年4月踏上中国土地前后的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化界真的为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忙碌起来了。最先作出反应的自然是最敏锐的报刊、杂志:《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25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9、10号,1923年9月10日、10月10日),北京佛化新青年会的《佛化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24年5月)上都出了“太戈尔专号”;《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在“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内还特地编辑了“欢迎太戈尔先生”的临时增刊;其他一些杂志如《民铎》、《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创造周报》、《文学周

报》、《民国日报·觉悟》、《向导》、《中国青年》等都刊载了泰戈尔的作品及有关文章。

《东方杂志》的“泰戈尔专号”以翻译泰戈尔的作品为主。该期封面印有泰戈尔像,封二有泰戈尔的手迹及《泰戈尔对于大自然的默化》图一幅。该专号发表的研究论文有《太戈尔学说概观》(王希和),翻译的泰戈尔作品有《海上通信》、《叶子园》、《喀布尔人》、《隐士》。王希和的文章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多字,开宗明义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当国内研究者的导言”。文章从哲学思想、教育思想、艺术观等方面介绍了泰戈尔学说的主要内容,最后总结说:“泰戈尔的哲学特点是在于人与宇宙的和谐,换言之,即求精神生活。所以他在教育和艺术两方面都主张人类的精神应由物质里解放出来,以达于无限。其次就在他提倡爱与牺牲,及活动,以此三者是人生之正路,入于无限所必经的。”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对泰戈尔的基本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在当时和后来都是不多见的。

《小说月报》的“太戈尔专号”规模更为可观。在9月的专号里,《卷头语》包括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诗句,《夏芝〈吉檀迦利〉序》中的摘句,泰戈尔《新月集》中的诗句;插图共有五幅,包括《太戈尔像》、《中年时的太戈尔》、《幼年时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诗》、《太戈尔手迹》、《在美国时代的太戈尔》;发表的相关研究和介绍文章包括《欢迎太戈尔》(郑振铎)、《泰山日出》(徐志摩)、《太戈尔传》(郑振铎)、《太戈尔来华》(徐志摩)、《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王统照)、《给我力量》(周越然)、《关于太戈尔研究的四部书》(西谛)、《太戈尔重要著作介绍》(徐调孚),以及译自日本有关泰戈尔研究的四篇文章:《太戈尔和托尔斯泰》、《太戈尔的戏剧和舞台》、《太戈尔和音乐教育》、《夏芝的太戈尔观》;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则有《诗人的宗教》、《新月集》选译、《吉檀迦利》选译、《隐谜》、《幻想》、《拉加和拉妮》、《我的美邻》、《园丁集》选译、《卖果人》、《马丽妮》等。在这个专号内还登载了一则消息,“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关于太戈尔的书”,包括已出或将出的太戈尔的作品六部:《春之循环》(瞿世英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邮局及其他》(瞿世英、邓演存译)、《吉檀迦利》(郑振铎译)、《园丁集》(郑振铎译)。在10月的专号内主要发表的是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卷头语是泰戈尔《跟随光明》一文里的句子,插图也有六幅:《五十岁时的太戈尔》、《太戈尔的

祖父》、《太戈尔的父亲》、《太戈尔和他的儿子及儿媳》、《到日本时的太戈尔》、《太戈尔的和平之院》。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则有《西方的国家主义》、《园丁集》、《牺牲》、《采果集》等。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以《晨报》、《申报》为主要阵地也纷纷报道泰戈尔来华的消息,追踪诗人在国外的行踪,并为文学、文化界欢迎泰戈尔的这股热潮“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真是“唯泰戈尔是谈”。如《申报》在报道泰戈尔即将来华的消息时也不忘随时随处赞扬他,说他“非遁世厌世的人,乃为入世爱世的人,与印度古代圣人绝对不同”;称赞他“欲以教育提高印度妇女程度,而又主张国家主义,作爱国歌,以励国人,然绝不蓄愤怒嫉妒,厌憎世界之意”。<sup>⑧</sup>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受到中国人如此热烈推崇的外国人,恐怕并不多见。

这些翻译介绍,不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基本哲学观和文学思想有了大致的了解,而且也使国人对泰戈尔的家庭背景和基本生活情况有了直观的印象,使人未见其人好像已闻其声,睹其容,仰其行。这为泰戈尔来华实在是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 中篇 交流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抵达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勱、郑振铎,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的代表在汇山码头迎接。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正式开演。

### (一) 欢迎者的态度

自泰戈尔下船至5月29日从上海赴东京,鲜花和掌声就包围了他。上海的徐志摩、张君勱、瞿菊农、郑振铎,北京的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甚至溥仪,纷纷以各种形式欢迎泰戈尔来华。在当时军阀混战、政

局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对泰戈尔的欢迎确实成了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对于泰戈尔的来访,梁启超、徐志摩等表现出由衷的欢欣。梁启超此时已结束欧洲之行,完成了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明到欲以中国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转变。他坚信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将流行于世界,这和泰戈尔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对泰戈尔此次来华,梁启超当然恭迎有加,前前后后出了不少力,甚至亲自过问泰戈尔在华的生活起居。对泰戈尔的文学、哲学以及政治主张,他也很赞成。为了使大多数中国人能对泰戈尔的学说有大致的了解,他还亲自作了两次演讲。

反对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的胡适本质上是反对泰戈尔来华的,但因为泰戈尔与他都主张采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普通工具,以替代掌握在有限学者阶层手里的经典语言,所以对泰戈尔的来华也表示欢迎。甚至在泰戈尔受到攻击时,还出面为他辩护。

与胡适相反,有一些欢迎者恰恰是因为泰戈尔在中国宣讲东方文明而对他表示热烈欢迎的。这里是指一般的欢迎者,他们欢迎泰戈尔的心理动机,通俗地讲,就是泰戈尔大长了东方人的志气,大灭了西方人的威风,替东方人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东方长期受西方的压迫和侵略,现在有了个泰戈尔出来抨击西方文明,当然让人感到解气。就如当时留德的魏时珍在听了泰戈尔1921年6月8日在德国所作的《东西问题》的演讲后在日记中所记:“午饭后,略睡,起时,觉泰戈尔之演讲,虽无新义,然其痛诋欧洲人之生活与思想,实可为东方人出气,此其气魄,殊有足惊者也。”<sup>⑩</sup>

徐志摩对泰戈尔来华更是欢欣之至,热情之至。诗人气质使他说了很多言过其实的欢迎词。他在《太戈尔来华》中说:“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更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答说太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sup>⑪</sup>而实际上当时除了冰心之外,还谈不上有谁受到泰戈尔这么大的影响。泰戈尔来华后,徐志摩不仅时时伴侍左右,而且以泰戈尔弟子自居,甚至以父子相称,还随泰戈尔去了日本,又专程把他送到香港后才返回。另外,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和创立者,这个文学团体

的成立,与泰戈尔来华很可能也有关系。徐志摩把原先与胡适等好友的聚餐会定名为新月社,可能有取悦客人的意思。而正式成立后的新月社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演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再后来,泰戈尔受到国内进步知识分子的攻击,而且泰戈尔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时,徐志摩还千方百计在他面前掩饰。更有甚者,为了使泰戈尔已经失望的情绪再兴奋起来,徐志摩最后竟然还替林长民代表当时的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邀请泰戈尔再度访华。军阀、政客邀请一个诗人来华访问,无非是为自己增加一些政治资本罢了,只会使被邀请者更加遭人唾弃。幸好诗人没有接受,否则他在历史上可能就要留下与封建恶势力勾结的罪名了。

实际上,梁启超、徐志摩等人只是在竭尽全力把泰戈尔变成与中国世事隔绝的可居的奇货,变成可用于抬高他们自己身价、借机炫耀自己的宝贝。他们织下层层华丽的帷幕,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做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也正应了郭沫若一针见血的断言:在对泰戈尔的思想、作品没有作系统的考察研究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什么“泰戈尔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sup>①</sup>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悲哀。

## (二) 批判者的态度

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只有鲜花,还有尖利刺人的荆棘。一派崇拜赞扬声中,泰戈尔也受到了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实际上,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和谐的气氛。有一次讲演,泰戈尔晚到了半小时,就有一家报纸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北京有人说他是政客,不是诗人,要他只管去作诗,莫管人家的国事。甚至骂他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在这种尖刻、激烈的批评声中,泰戈尔甚至取消了计划在华的三次演讲。

对泰戈尔批判最力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

其中代表人物包括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鲁迅对泰戈尔访华，也予以嘲讽。

郭沫若根本否定泰戈尔的哲学可使东方民族起死回生。他把请泰戈尔以及罗素、杜威到中国讲演都看做是好像“乡下人办神会，抬起神像走街一样的热闹。但是神像回宫去了，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呢？——啊，可怜！可怜只有几张诳鬼的符箓！然而抬神像的人倒因而得了不少的利益”<sup>②</sup>。茅盾虽然敬重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但也明确表示：“我们绝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的台戈尔；我们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底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台戈尔！”<sup>③</sup>对泰戈尔的来华，吴稚晖和林语堂也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吴稚晖讽刺泰戈尔所提倡的主张无异于把融合了大小乘佛教的诗篇，贴在城墙上抵抗敌人的机关枪；<sup>④</sup>林语堂则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嘲笑姿态，讽刺泰戈尔是因为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才采取最无聊的精神安慰法。<sup>⑤</sup>瞿秋白则尖锐地指出泰戈尔要东方人对侵略者施以“慈爱宽恕”的“东方文明”的危害，认为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就“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地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sup>⑥</sup>沈泽民的批评则针对泰戈尔提出的“人类第三世界”的理论。按照泰戈尔的说法，所谓第三世界，就是重精神、主静的东方文明最终战胜重物质、主动的西方文明后出现的一个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的真善美的世界。沈泽民认为这种理想的第三世界是虚幻的，是冥想主义，要达到这“第三世界”，泰戈尔的精神主义是行不通的。反之，倒应更加努力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泰戈尔的这种主张，“可谓迷恋骸骨，与中国现在一般国粹派，毫无二致。这种思想若传播开来，适足以助长今日中国守旧派的气焰，而是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sup>⑦</sup>。

陈独秀是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文化人之一，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3月，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